

《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与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下）——中国工业化战略转型与《论十大关系》主题变化

王海光

摘要：本文用政治文本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以《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中的三个历史文本（1958年稿本、1965年稿本、1975年稿本）为基本史料，梳理了《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演变和经典化的过程，考察了其文本流变与“反冒进”、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文革运动的历史语境关系，澄清了一些长期流传的误读误解的问题。以期通过“以苏为鉴”和以苏为师、“多快好省”和综合平衡、“重轻农”和“农轻重”、革命和生产等矛盾问题的分析，探讨其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的内在冲突，呈现一个认识毛时代工业化道路的文本视角。本期刊登的下篇集中讨论毛泽东时期中国工业发展道路的变化和《论十大关系》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论十大关系》；重工业优先；中国工业化道路

作者：王海光，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史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他的主要著作有：《旋转的历史》（1995年出版）；《从革命到改革》（2000年出版）；《林彪事件》（2012年出版）。邮箱：wanghaiguang@sina.com

Title: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Proposal and the Beginning of Mao Zedong Era of Industrialization – Canonization of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o Zedong’s Era (Part Three)

Abstract: With textu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ree historical manuscripts (1958, 1965 and 1975) from canonization process of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In addition to clarifying the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canonization of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will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al ties between its deformation with "Anti-rash Advance", "Great Leap Forward", National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campaign. The aim is to explain the current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interpretation. By analyzing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inciples of "Take Soviet Union as a mirror" and "Take Soviet Union as a teacher"; socialism "More, Faster, Better and Cheaper" and "Comprehensive Equilibrium"; economic policies "heavy industry, light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e, light industry, heavy industry"; revolution and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hope to clarify the internal conflict between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olicy, thus presenting a textu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Mao's era industrialization.

Keywords: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nti-rash Advance, Great Leap Forward, canonization of Mao Zedong's works, the journey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uthor: Wang Haiguang, is a retired history Professor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He currently holds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Wang'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Rotation of the History (1995),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2000) and The Lin Biao Event (2012). Email: wanghaiguang@sina.com

在上篇、中篇分别分析了《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及其经典化过程之后，本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毛泽东生前没有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二是如何理解《论十大关系》政策价值的时代畛域。前者为文章的总结，着眼于分析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与《论十大关系》的内在冲突；后者为文章的余论，着眼于分析重工业化战略的转型与《论十大关系》的时代价值。试图从一篇文章的历史视角，观察中国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的成败兴废及其时空维度。

一、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与 中国国情的内在冲突

自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后，便长期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但在毛泽东作报告后的 20 年间，人们是只闻其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几次建议发表，先后整理过几个版本，而且也经毛泽东亲自审读过，但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公开发表。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复杂问题，是理解毛泽东时代政治与经济的一大因緣。

毛泽东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有文本的整理和发表的时机，有外部政策环境的制约，有毛泽东个人偏好的因素，有中央高层在中国工业化方针政策上的意见分歧，还有《论十大关系》内容的自相矛盾，以及理论与实践上的二元冲突等等。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论十大关系》，但在实践中却是背道而驰的。理论上讲的是“农、轻、重”，实践上做的是“重、农、轻”，长期积累下了许多根本性的体制问题。从大跃进的“同时并举”和“两条腿走路”，到文革的“抓革命、促生产”和“三线建设”的备战经济，这些问题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性，表现了《论十大关系》在主题上的双重性和解释上的多义性。而这个文本的双重性和多义性，及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二元冲突特征，从根本上讲，又是源自于中国移植斯大林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的内在矛盾。

众所周知，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现代化实质上就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工业化生活方式的普遍扩散过程。世界工业化的基本规律表明：国民经济各部门必须按一定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一个部门的技术变革必定牵动相关部门相应地发生技术变革。无论资本主义体制还是社会主义体制，都摆脱不了这一规律。斯大林在苏联独创了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并把它确立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规律。斯大林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有两大理由：一是可以实现工业化的高速度。认为从重工业起步，能够比从轻工业开始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更快更高的发展速度；二是为了应对国内外的战争威胁。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是在国内外战争中产生的，从列宁时期就以发展军事工业为巩固新政权根本，并长期形成了根深蒂固

的“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¹这个“落后就要挨打、国强才能民富”的工业化赶超观念，对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建设影响非常深远。斯大林把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制造出了一个苏联体制的工业化赶超神话，并宣传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普遍规律。但是，斯大林的这个规律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不符合苏联工业化的史实。

1920年代末，斯大林否定了布哈林的“平衡论”，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质上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以军事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推动了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斯大林对苏联工业化的完成时间说法不一，有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说，也有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说。但苏联工业化并非平地起步的，而是在沙俄时期工业化体系基础上的继续工业化。斯大林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的实质是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用高积累高投入来制造超高速发展，通过剥夺农民来积累工业化资金。²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成绩比较显著，特别是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不仅付出了巨大代价，还制造出了一些长期性根本性的问题。然而，斯大林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特定条件的产物，奉之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金科玉律，不仅为历届苏联领导人所遵循，而且还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东欧诸国和中国都采取了斯大林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赶超战略。

这些年来，学界关于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的利弊得失，已有了基本的共识。认为重工业有三个基本特点：1、资金密集型产业，投资规模大；2、建设周期长，回报缓慢；3、资本有机构成高，主要技术设备需要靠国外引进。这些特点决定了发展重工业必须要大规模进行资本积累与供给，需要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

1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23-124页；参见陈紫华、王章辉、孙娴主编的《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苏联经济理论家普列奥布拉斯基和托洛茨基等人在1920年代中期提出了用牺牲农民的办法积累工业化资金的主张。斯大林在托洛茨基“超工业化”和“工业专政”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工农剪刀差剥夺农民的“贡税”论。当年，布哈林批评这些理论是把农村当做殖民地，剥夺农民的政策实际上是杀鸡取卵等等，都为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观点。

计划配置，以保证经济剩余的积累流向重工业部门。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与全盘农业集体化是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剥夺农民为重工业输血。以苏联地大物博的自然禀赋，又有俄罗斯的工业化基础，当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一经启动，就因为暴力剥夺农民，导致农村破产，造成了 30 年代大饥荒，造成 1000 多万人口死亡³。到 1953 年，苏联粮食产量还低于 1913 年的水平。由于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畸形，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生产落后，“实际上是半崩溃的农村”状态。重工业高速发展是靠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的粗放型工业化，资源浪费巨大而经济效益低下。直到苏联解体前，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才为美国的 55%，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更低了。⁴所以，虽然苏联军事工业高度发达，雄踞世界榜首，但生活日用品却长期匮乏，农产品长期没有达到沙俄时代的产量，人民生活陷入短缺经济状态，被人们讥为是卫星上天木犁落地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国家和中国采取斯大林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脱离本国国情，无不带来经济灾难性后果。

苏联关于工业化成就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虚假宣传，制造了诸如苏联 10 年走过先进国家 50 年到 100 年等虚夸不实的宣传言论，让许多人都信以为真。这对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包括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化成绩非常景仰。然而，中国的自然禀赋远不及苏联，可耕地少，人口压力大。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工业基础薄弱，文化科学教育落后，各方面专业人才奇缺……，实行苏联工业化模式困难很大。当时曾有工商界人士提出，国家搞重工业，民间搞轻工业。这是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一个设想。由于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与中国的自然禀赋以及资源动员能力的矛盾冲突更是剧烈非常，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南橘北枳、水土不服的问题。而由此造成的国民经济许多长期性根本性问题，又比在苏联本国发生的问题更

3 陆南泉：《如何评价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政策？》陆南泉等《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册，新华出版社，2010 年，第 261-262 页。

4 徐天新：《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陆南泉等《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册，新华出版社，2010 年，第 229-234 页。

为严重。这是中国提前放弃斯大林模式，走向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背景原因。

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选择是苏联模式的重工业发展战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于斯大林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的偏好，不仅因为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捷径，还有着社会主义优越性观念的意识形态信仰。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在不考虑比较优势战略的情况下，就急于制定了“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强行移植了斯大林工业化模式。当时梁漱溟批评政府剥夺农民的政策说：“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⁵。毛泽东严厉批驳了梁漱溟要求“施仁政”的观点，开诚布公地说：建设重工业就是我们的“大仁政”。⁶在全面移植苏联工业化模式过程中，中国亦步亦趋地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农业集体化政策，迅速完成了对城乡社会全面的产权改造。在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又把群众运动的方式运用于大跃进，形成了群众运动型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方式。

由于中共领导的土改运动消灭了地主、富农阶级，在随之而来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农村没有发生苏联那样的激烈反抗，很快实现了全社会产权改造的国有化，但集体化造成的后果是同样严重的。不管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在国家要素禀赋不具备的情况下长期发展重工业战略，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造成整体经济的停滞和恶化。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所总结的：城乡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⁷中国在农业集体化和产权变革上的“急、粗、快、纯”，一股脑儿地摧毁了原有的市场经济主体，城乡经济生活立马就出现了停滞和萧条。在1957年整风中，人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最集中。这些意见不仅是知识分子提的，工人、农民这些社会底层群众提得更多也更具体。担心知识分子的意见与工农群众的情绪相结合，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为什么会从整风运动急转为反右派运动的一个关键因素。

5 梁漱溟 1953年9月11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发言草稿。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2003年，第274页。

6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5页。

7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政治动员的强力手段，迅速把一切社会资源掌控起来，但工业化建设却不是一蹴而成的。随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初步建立，它与中国国情的兼容性矛盾也就立刻显现出来了。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资源配置的运行成本很高。计划管理和计划平衡，需要建立一套程序严密的规章制度，需要进行循规蹈矩的科学管理，需要培养一大批专业素质的知识人才……，而这些都是中国工业化最缺乏的软肋。计划经济的那些繁文缛节的规章制度、细密而严格的条例规定、精确而刻板的分工协作，正是大工业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时代特点。这意味着，中国即使真正要实行苏联的计划经济，也得需要有长期积累的耐心，认真地学习大工业的生产管理规范，遵循国民经济各部类关系综合平衡的经济规律，循序渐进地一步步完成工业化的进程。然而，循序渐进的发展速度，按部就班的专业分工，规规矩矩的条文规制，这些具有现代化大工业标志的东西，却正是毛泽东对苏联体制最不喜欢的地方。毛泽东多次讲他对前 8 年照搬苏联模式不满意，要走出一条比苏联发展得更快更好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都可以看出他的不懈努力。然而，从传统农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是一个漫长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毛泽东是出身农家子弟的革命家，对现代工业文明和社会化大生产是缺乏知识的。还没有学会走路，就开始跑步了，怎么能不跌跤呢？

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行为中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革命家逆取天下的豪情冲动和执政者顺守治道的规则意识的矛盾冲突，急功近利的革命理想主义与循序渐进的建设思维方式的矛盾冲突，农业文明的本土观念与工业文明的现代观念的矛盾冲突等等。这些矛盾冲突不仅存在于毛泽东身上，也存在于新中国第一代执政群体之中。其表象是好大喜功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量力而行的革命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分歧，内里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落差冲突。一面是模糊的宏伟目标和大而化之的口号，另一面是精确计算的现实目标和数字化管理，形成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貌相。

新中国的第一代执政群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奉者，同样也都是“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的坚定追随者，也都希望通过移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

济体制，由国家集中所有资源，经过高积累高投入的艰苦奋斗，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文革中被高度政治化的所谓“建国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在同一建设路线上的党内不同意见分歧，具体说来，就是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大目标下的快慢、急缓、重轻的政策选择性问题。但重工业路线成为苏联国家工业化的模式，就是在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的苏共党内斗争确立起来的，被赋予了强烈的排他性。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涂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凡是对斯大林工业化的反对和质疑，都是被视为国外敌对势力和敌对阶级分子的破坏行为。这种阶级斗争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也随着对斯大林体制的移植而进入到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来了，以国家强力推行重工业优先及其政策制度，并使之成为了在不断制造阶级斗争的一条制度路径。

中国在实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中的一些制度衍生物，如统购统销（苏联的余粮征集制度）、农业集体化（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苏联的居住证制度）等等，也都被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标志，反对这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反右派运动中，中共中央下发的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第一条规定，反对党和政府关于社会经济基本政策，即工业化、统购统销等，都应划为右派分子。⁸这就把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给高度意识形态化了，后果非常严重。从反右运动开始，在社会上和党内不断进行“开展走资本主义与走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和两个阶级的斗争”的政治运动。不仅在社会上消灭了不同意这种制度安排的声音，而且还要把斗争矛盾转到党内，以是否赞成高速度作为划分“左”与“右”的政治标准。在大跃进运动中，一大批主张稳妥发展的同志被划入了右倾机会分子的行列。这条路径发展的尽头就是文化大革命。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与毛泽东在工业化建设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分歧，被上升为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这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挫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制度环境上讲，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与斯大林体制

8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1957年10月15日，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二册，1988年，第322页。

是互为表里的，即国家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思想资源进行的全面垄断，实施全社会高强度动员，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这种高度垄断、高度动员的全能国家体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标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最高领袖拥有最高政治权力和真理裁判权。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中央集权体制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不论苏联、还是中国，概莫能外。事实上，无论斯大林制定的政策方针有多么错误，危害多么严重，都只有在他身后才有可能进行纠正。这是苏共二十大召开的时代背景，开启了非斯大林化的社会主义改革之门。然而，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只是一篇文章的“开题”，并不意味着对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有多么深刻的认识，还没有走出斯大林体制的制度樊笼，在许多方面还延续了斯大林体制的错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虽然检讨了斯大林过分忽视农业的经济政策，但并没有否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仍然还是高举“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旗帜，还仍然延续了斯大林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苏共二十大提出：要在历史上最短的期间内，实现“在按照人口计算的产品生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目标。⁹

苏共二十大暴露出了斯大林体制和苏联工业化中的许多问题，一方面让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了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迷信，不再作为完美无缺的偶像和亦步亦趋的样板；另一方面又给了毛泽东吸取前车之鉴，进行“弯道超车”的自信，认为“以苏为鉴”可以使中国能够比苏联发展得更快更好。毛泽东一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更强化了他加快实现“重工业优先”工业化赶超战略的决心和信心。中共中央 1956 年 12 月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高度肯定苏联工业化的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¹⁰这与苏共二十大的工业化赶超思想是一致的，并直接启发了毛泽东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思想。

《论十大关系》中的来自苏共二十大的最重要启示，是在重工业化优先战略中的“兼顾”和“平衡”的思想，“兼顾”和“平

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 1956-1960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人民日报》1956 年 3 月 10 日。

10 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29 日。

衡”的核心是实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总目标是实现工业化的赶超。最能表现毛泽东赶超思想的，应该就是“多、快、好、省”的口号了。《论十大关系》表达的“多、快、好、省”的内容要求，有两项关键词：一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社会动员；二是综合平衡各项关系的稳步前进。前者代表了急于赶超发展的热情愿望，后者表达了一种“兼顾”与“平衡”的经济理性。两者的二重性矛盾，不仅表现在中央高层的认识分歧上，也表现在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反复的过程中。1956年的“反冒进”，就是中共党内大干快上的革命热情与综合平衡的经济理性的一次重大冲突。中央领导群体以集体力量阻挡了毛泽东的经济盲动发展企图，这是唯一的一次，依据的理由就是量力而行的综合平衡。其中，《论十大关系》就是平衡发展的理据之一。毛泽东在反右派运动后，在党内连续大批“反冒进”，批的就是“综合平衡”的计划观念。他认为“综合平衡”是消极平衡，要搞留缺口的计划，依靠发动群众运动来实现“动态平衡”。

毛泽东激进的经济发展计划是企望用革命战争的政治动员方式，充分调动地方、基层、群众的积极性，通过向地方放权，发动群众运动，最大限度地突破计划平衡的瓶颈，填补资金匮乏的缺口，来创造工业化发展的高速度。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把“综合平衡”变为“动态平衡”，“统筹兼顾”变为“两条腿走路”，固然是他的经济激进主义的目标初衷，实际上也是基于现实政治的不得已选择。在反右派运动后，国家懂现代工业和现代管理的知识人才丧失殆尽，不能不以大量耗费民力的群众动员方式，来实现工业化大干快上了。所以，在大跃进敢想敢干的“破除迷信”中，反智主义盛行天下，充满了假大空想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薄一波谈话讲：“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不要二十年，苏联就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就变成四个美国。”在实践中，这个赶超时间又一再缩短，成为几年就能实现的事情。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还提出了立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规划，企图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组织形式达到共产主义目标¹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蔑视，对国外工业化经验的诋毁，对经验常识的毁弃，都是前无古人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2008年，第732-733页。

后无来者的。从大跃进开始，中国走上了原则与斯大林模式相同，而方法又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一条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运动型经济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斯大林重工业化战争动员模式的基础上，又有了中国革命战争民众动员经验的创新发展。大跃进是建立在统购统销剥夺农民粮食的制度基础上的激进工业化。各地虚假的粮食高产卫星捷报频传，使毛泽东以为大搞群众运动使粮食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遂以不断革命的精神，迅速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认为农业可以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要求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上来。¹²会议提出了1,070吨钢的高指标，企图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一举占领工业的制高点，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到高潮。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同时并举的，是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1960年底，全国职工人数陡然增加到5,043.8万人，超过“跃进”前的1957年的一倍多，全国城镇人口由此前的9,949万人上升至1.3亿人。¹³吃商品粮人口比例由1957年的15%提高到1960年的近20%。造成了巨大的财力、物力的浪费和大量人口损失，不得不紧急刹车。中共中央于1961年5月正式做出了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的决定，三年内精简城镇人口2,500万人以上。¹⁴这是毛泽东“同时并举”的“动态平衡”的一场群众运动型工业化战略的大失败。

从大跃进的“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同时并举”“全党大办”，到大小“三线”“抓革命、促生产”，到大庆精神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等等这些口号，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逻辑，即反对“消极平衡”的右倾保守思想，鼓吹“鼓足干劲”的大干快上。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经济激进主义的政策口号在推行过程中，又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转成为政治激进主义的政策口号。在激进的工业化计划失败之后，毛泽东又试图以阶级斗

12 何蓬：《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13 《1961-1963年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初步安排意见（稿）》（1961年7月12日），《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200页。

14 据中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1962年底“全国吃商品粮的供应人口减到10,941万人，比1960年的13,635万人减少2,694万人”，《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1988年，第93页。

争方式收拾残局，以不断制造阶级敌人进行社会整合，形成了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模式。

在《论十大关系》发表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其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务实派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着某种政治角力的关系。毛泽东强调的是“多、快”的激进发展，赋予《论十大关系》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政策指导意义。而务实派领导人强调的是“好、省”的稳步前进。他们从量力而行的实际出发，赋予《论十大关系》平衡关系，稳健发展的政策指导意义。贯彻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1955年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改造，1958年的反“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到60年代的“三线建设”和文革的战备经济，都是毛泽东激进主义建设路线的体现。而1956年“反冒进”、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文革时期的两次整顿等，则是务实派领导人对毛泽东激进主义路线错误的纠正。

在这个纠错过程中，政治风险最小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毛泽东的话来消解毛泽东的激进主义。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引用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一段话“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没有引后面重点的“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毛泽东当时没有发作，但心里记下来这笔账。他后来在反“反冒进”时狠批这篇社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卖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反‘冒进’。”¹⁵毛泽东在这里表达的愤怒，主要还不是政见分歧，而是裁剪他的话选择性地使用。所以，对于具有多义性《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毛泽东自然会有不能授人于柄的慎重考量。

《论十大关系》中体现的“统筹兼顾”的经济理性思想，是务实派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围绕着《论十大关系》是否公开发表的党内高层分歧，实际上是一个掌握经济工作话语权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的辩证多义性问题上，最后解释权无疑是毛泽东的，但有一个公开发表的明文毕竟是对解释权随意性的一种限制。为了避免

15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传达稿），1958年1月。

落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被动，避免在“重、轻、农”倒置的经济政策上出现名实不符的疑问，不公开文本可能是一种比较方便的做法。但这并不能说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权谋，更不能说是毛泽东自己背叛了自己的正确思想。事实上，从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改造，到发动大跃进，到“三线建设”，到文革的“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的工业化思路都是一以贯之的。可以说，在《论十大关系》上反映出的这个二律背反的逻辑，实际上是中国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内在矛盾的显现。而且由于重工业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模式高度结合的二重性质，政治动员成了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又会使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问题高度政治化了，构成了激进的经济方针和激进的政治方针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乃至形成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顶峰。

二、重工业化优先的工业化战略的转型与 《论十大关系》的时代性价值

毛泽东工业化道路有两次举国动员的大实验，一是大跃进，二是文革，都以惨败而告终。历时三年大跃进运动，造成了人、财、物的巨大损失。据官方估算，大跃进时期，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十年文革时期，按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¹⁶ 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营企业30年积累的固定资产的总和，败掉了全国人民辛苦30年积累的同样一份家当。¹⁷ 还有研究者的估计更高，认为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损失2,600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十年文革的损失6,400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¹⁸ 还有“三线建设”的损失，从1965到1980年，国家对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总计2,052.68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9.01%。在1966到1970年的

16 《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2月20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3-384页。

17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317页。

18 侯远长等：《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

“三五”时期，这个比重为 49.43%，几乎占了全国总投资的一半。¹⁹按照“靠山、分散、入洞”的“三线”建设方针，把巨大的投资投入到了地理偏僻、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长期形不成生产力，经济效益极其低下，成了国民经济的一大包袱，许多建设工程都打了水漂。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亚于打了一场中型战争。

相对于发展数字而言，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的问题是更具根本性的。宏观上，产业结构的农轻重比例长期严重失调，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二元结构分离，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高积累维持的经济增长扭曲了国民收入的分配，小而全的单位体制导致了经济的封闭性；微观上，责权利分离造成单位经济效率低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积极性。在体制上形成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制度怪圈。年复一年地重演着“工业报喜，农业报忧，库存积压、财政虚收”的剧目。付出了直接经济损失几千亿的巨大代价，国民经济陷入了既混乱又僵化的体制性死结。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不仅没有突破斯大林体制的藩篱，反而以群众运动的方式破坏了其计划平衡的合理部分，把计划经济直接变成了长官意志经济，更加剧了重、轻、农比例倒置的体制弊端，经济效益逐年递减。在毛泽东时期的四个五年计划中，经济效益最好的，还是移植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经济收入计算，“一五”时期为 35 元，“二五”时期大跃进是负增长，“三五”时期下降为 26 元，“四五”时期下降为 16 元。²⁰

近来也有研究者认为，文革经济并没有达到“崩溃的边缘”，总体上还是有所发展的。²¹这也是可以列举出许多数字证明的，如国防的壮大、科技的发展、某些工业部门的增长等等。但是，这里实际上有一个评判标准的问题，即是以国家主义的目标为标准？还是以社会发展的目标为标准？国家利益是否是破坏个人利益的理由？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脱离斯大林工业化思维模式

19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年，第 414 页。

20 转引自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年第二版，第 319 页。

21 陈东林：《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真理的追求》1999 年第 4 期。

和国家主义的分析逻辑。其实，经济发展是一个常识性道理，根本上讲，就是两条。一是人民福祉的增长，具体说就是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经济效益的增长，具体说就是投入产出比的提高。离开这两条的数字游戏，不过是故弄玄虚的戏论。

从人民福祉而言：在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过程中，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的辛苦劳动，但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以 1976 年城乡居民粮食和食用油的平均消费量计：农民是 372 斤粮食 2 斤食用油，比工业化前的 1952 年，还少了 56 斤粮食 1.4 斤食用油；城镇居民是 425 斤粮食 9.2 斤食用油，比 1952 年还少了 56 斤粮食 1 斤食用油。²² 到文革结束时，职工的平均工资 1976 年比 1966 年下降了 4.9%。农村还有 2 亿多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国家经济的发展不能体现在人民生活上，这样的发展能有什么意义吗？

从经济效益而言：运动型生产方式造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动力，使经济效益全面降低。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曾撰文分析文革经济，把大跃进经济称为是“突发型冒进”，文革经济称为是“累积型冒进”。认为两者本质相同，都是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片面追求高速度，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其后果都是：1. 工业与农业比例失调；2. 工业内部，轻重工业之间、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比例失调。农业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比例失调；3.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积累率过高；4. 消费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增长，民众生活水平下降；5. 经济效益很差，财政赤字很大。他还认为：大跃进的“突发型冒进”容易察觉，持续时间短，相对而言后果的消除比较容易。而文革的“累积型冒进”不大容易察觉，持续时间长，后果的消除更为困难。²³ 诚如斯言，文革的结束后，文革的经济运行方式并没有随之结束，其运动型经济模式和国家主义的思维方式及其变体还将长期存在。这正是后文革时代的社会转型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提出“抓纲治国”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

22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9-1983）》，内部资料，1983 年，第 538-539 页。

23 李成瑞：《“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张化等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2006 年，第 398-399 页。

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大目标。但是，这时中央领导人的经济发展思想仍然延续了毛泽东的工业化思路，还没有走出运动型经济的路径，所以在经济发展上又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规模的项目引进，造成国民经济新的比例严重失调的紧张局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人们开始对毛时代的工业化道路进行反思，总结过去经济建设的沉痛教训。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按劳分配”大讨论和“生产目的大讨论”。这两个大讨论，一个从微观经济的角度，一个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提出了毛泽东时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两个根本性问题，进行了痛定思痛的深刻反省。后者的反省意义尤其重要。

“生产目的大讨论”直接针对毛泽东工业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有第二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之称。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概念表述，来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50年代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从60年代“反修防修”开始，不断扩展外延。由“发展生产，满足需要”，包括了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国防的需要、外援的需要，甚至国家机关行政管理费的需要。到文革中，又笼统地归结为“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实则是以国家目标来否定“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手段是“抓革命、促生产”。²⁴这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穷过渡”理论，虽然明确提出是文革，但渊源可以追溯到人民公社化的“一大二公”，还可到农业集体化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它是一种倒置人民的国家主义理论发展到文革的极端态。“生产目的大讨论”的实质，就是要明确中国改革和发展经济的人民性问题。

“生产目的大讨论”开始于1978年下半年，先是在经济界和理论界酝酿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要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评论文章。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转载，题为《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形成了全国大讨论。“生产目的大讨论”直接接触到了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的根本症

24 陈胜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研究情况简介》，《人民日报》1979年12月4日。

结，即为什么而生产，是为提高人民福祉而生产，还是为生产而生产。这不仅是一个搞得很混乱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系改革方向的现实问题，有着强烈的政治针对性。正如当时有论者所言：不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不能有效地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从根本上纠正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²⁵对过去一些重大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省。如“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方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理论，“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忽视农业的产业政策，基本建设规模不断膨胀和不断拉长的胡子工程，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以及“先生产、后生活”等，都摆上了这场讨论的桌面。参加生产目的大讨论的人士众多，不仅有经济界、理论界的人士，还吸引了一些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参与。

10月2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济学家于光远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11月间，北京的一些经济部门和经济理论界人士相继召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问题的研讨会。12月6日，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本地报纸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文章，明确提出：“通过这场讨论，要更好地理解 and 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计划于市场相结合的提出，是生产目的大讨论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成为不久后的“市场与计划”争论的前奏。讨论引起某些高层人士的意见，胡乔木也出面讲，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表述有问题。所以讨论一度被叫停了。²⁶但是，这场大讨论揭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若干重大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不久，“生产目的大讨论”又继续下去了。前后历时一年半。

随着“生产目的大讨论”的兴起，1979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现“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开始了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根本转折，重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发展道路。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检讨过去经济建设的失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

25 李平：《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4日。

26 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2012年，第241-242页。

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1981年11月，赵紫阳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使我国经济更好地持续发展。”真正从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并提出十条方针。1982年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在“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努力求得国民经济按比例地长期稳定地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制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和消费品工业，使重工业密切为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服务等产业政策。“六五”计划的制定，是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实现了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和突出标志。²⁷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突破了“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是资本主义”等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改变了重工业优先战略，开始走向一条效益优先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市场经济的改革奉行的是产权明晰，利益明确，公平公开的规则，不同于计划经济行政指令性的配置资源手段。中国1980年代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以后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农村改革使农民有了土地经营权，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并为工业化提供了广大的人力资源；产权改革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提高了国家工业化的整体经济效益；对外开放使中国得以充分利用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全面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使中国经济的自然禀赋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也不断丰富，从片面求强求富的工业化目标，转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论十大关系》的时空环境。大一统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发展目标，行政指令性的配置资源方式，闭关锁国的自力更生，精神万能的鼓足干劲，大干快上的群众运

27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7-449页。

动，等等这些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发展方式，都已经进入了历史。曾经盛极一时《论十大关系》的宣传学习高潮，也随后转为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探索的思想史研究。但是，历史的翻篇并不是戛然而止的切断，而是某种形式的延续。社会转型中的旧制度遗蜕，观念更新中的旧思维惯性，自然禀赋和人文禀赋的国情约束条件，都会长期存在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认识历史，汲取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所以，以改革开放的经历和眼光，再看《论十大关系》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也会有一些新的心得和问题发现。

中国的现代化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职能的转型与市场经济产权保障的国家法治体系的建立，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中国改革所有的利弊得失都是出自于此。从历史变迁的角度上来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这些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是有很大变化的。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如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随着阶级斗争时代的结束而走进了历史；如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工业化思路，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落实。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朱德在当年学习《论十大关系》时提出的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体制的建议，实际上现在还没有解决好；有的问题还在继续，如计划经济时代的“农业为基础”的问题，变成了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农”问题。有的问题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如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条件下更拉大了地域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的问题，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腐败猖獗的问题，官民矛盾的问题等等，都是相当严重的。这些问题并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彻底的产物，是没有彻底割除的斯大林体制的痼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作，还没有实现真正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系。

毋庸讳言，在毛泽东时代以求强为目标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下造成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转型而完全消失，有的问题还在市场化的条件下继续发展并有了新的深化。特别是 1990 年代以后的改革，政府把许多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放给了社会，造成了一些长期性的问题。在国家与人民关系上，国营企业改革的“砸三铁”，大批职工下岗；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大批失地农民；教育、卫生和住房制度改革，给民众生活造成了沉

重的负担。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带来了事权与财权的脱离，造成了地方的“土地财政”的泛滥成灾。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以GDP为主导的指标体系，追求数量级增长的高投入，付出了高昂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代价，加剧了经济产业结构和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状况，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效益低下。在工业生产方式中，高投入、搞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生产方式，不仅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甚至还有新的发展。据有关部门数据，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超过国外平均水平一倍以上。第二产业的人均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韩国的1/7，而单位产值的能耗，是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国家财力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公共卫生体系、公共教育体系、公共文化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没有得到相应发展。GDP总量占世界第二位，但社会发展水平却在世界百名之外，位于倒数之列。这些问题说明，处在工业化中期的中国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是更为复杂的综合平衡的要求，中国的发展需要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早在1960年代，一些学术团体和环保组织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为一些发达国家所接受。正式确定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国策提出，是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统筹”方针。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向。2015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根据这一发展理念制定的“十三五”规划，确定了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这就更加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发展了信息时代的中国新兴工业化道路的时代内涵。

然而，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的转轨，更是一个深化改革的政治体制建设目标。斯

大林统制经济的实质，是体制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这是重工业优先战略形成和实施的制度条件。它可以倾举国之力解决人造卫星的上天但解决不了广大人民的民生问题；可以搭建出世界级“航空母舰”的宏大规模，但无法实现技术领先管理卓越产品精良的高效益。所以，改变重工业优先战略并非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实际上是国家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历届领导人由于没有走出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经济发展方式低效粗放，规模庞大效益低下，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乃至社会矛盾郁结成疾，得不到有效疏导，最后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这个苏共兴亡的历史教训，是可以当做毛泽东“以苏为鉴”的续篇来看的。

事实证明，只有在法治健全的制度环境下，才能确保“以人为本”的落实到位；只有在公开公正公平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才能确保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法治体系的制度保障，是不可能走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循环率的，也就不可能保持“以人为本”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建设方向。虽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背景与《论十大关系》已是不同的历史时代了，但在体制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当前，统制经济的旧体制流弊与市场化信息化时代环境下的社会多元发展要求是不兼容的，新旧社会体制的矛盾冲突是十分激烈的，各种现实利益因素影响和改变国家既定战略发展方向的情况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吸取《论十大关系》提出和实践的曲折历程的历史经验，对清醒地认识开拓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复杂性，有效地应对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应是不无启示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2008年。
2.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
3. 陈东林：《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4期。
4. 陈胜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研究情况简介》，《人民日报》1979年12月4日。

5. 陈紫华、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欧美五国工业革命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1988年。
7.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二册，1988年。
8. 何蓬：《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
9. 侯远长等：《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
10. 李平：《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4日。
11.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12.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13. 陆南泉等：《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册，新华出版社，2010年。
14. 《毛泽东传（1949-1976）》上，2003年。
15.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16.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传达稿），1958年1月。
17.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9-1983）》，内部资料，1983年。
18. 《人民日报》1956年3月10日。
19.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20.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
21. 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2012年。
22.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23. 张化等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2006年。
24.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